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三期 ——  
(二〇〇九年八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8b)

---

【史实辨析】	口述史的困境：一九六六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陈焱 · 杨东晓等
【史海钩沉】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纪坡民
【不堪回首】	“文革”如同埋在心中最为疯狂的奥斯维辛	高 瑜
【痛定思痛】	没有人权的主权非常残忍	景凯旋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实辨析】

口述史的困境：一九六六如何打捞出来三个老舍

• 陈焱 · 杨东晓等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了一位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他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纪念日子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这位作家：老舍。

四十年前老舍纵身一跳的太平湖早已被填平了。老舍在跳湖自杀后的第十二年也已获得平反，但关于老舍之死、关于谁打捞了老舍的尸体，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上篇：“只相信一个人的叙述是冒险的”

从一九九三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老舍之死”进行了长达13年的追踪采访，有趣的是，在“谁打捞了老舍尸体”这一环节上，前后出现了三位不相识却又自称自己才是惟一打捞者的“历史见证人”。不同视角的叙述，把由模糊的历史记忆所带来的多元性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生态过程背后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下面是傅光明接受采访时的谈话摘录。

其实开始的时候动机特别简单，就是想事情过去了将近三十年，通过寻访一九六六年的历史当事人，把当年的历史现场做一个尽可能逼真的还原。

第一位是请朋友帮忙打听到的，采访他之前，我们夫妇充满了兴奋的期待。当然不会想到对他的访谈发表，并经发行量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以后，相继出现了第二位、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在那次采访后的半年，我们采访到了第二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白鹤群先生。

那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一大早，我赶到北京市政协门口，并从这里搭车去平谷，应邀给那里的由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培训班”主讲《由（老舍之死）谈谈口述历史》。下午的会散了以后，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采访过白鹤群，说白先生了解打捞老舍尸体的经过。我在与白先生电话联系时，白先生显得十分激动，说非常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说自己是打捞老舍先生尸体的人。

但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又过了半年之后，我们采访到第三位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证人朱军，巧的是他还与第一位打捞者当时同在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他是找到《作家文摘》编辑部曾经担任过丁玲秘书，也曾做过我同事的编辑，说他才是真正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并留了联系电话。

三位证人都说老舍尸体是他们在渔场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的，但他们却是在同一时间（1966年8月24日清晨，朱先生记得好像应是8月23日）和同一地点（太平湖）打捞上同一个人（老舍）。

当初我对这些“记忆”也没有什么质疑，想法很单纯，觉得他们（三个口述者）谁也不会编造历史的故事，直到今天，我想他们大概也不会刻意地伪造历史，但是“记忆”可能在经过时间、岁月的打磨后，出现错觉或某种暗示，并不自觉地修正了某种记忆。而这个修正了的、不自觉的记忆，又可能使叙述出来的历史文本和当时历史真实的样子相差得非常遥远。

我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困惑阶段，我发现我采访的人越多，好像越无法还原那个历史现场，因为大家说得都不一样，特别是细节问题，比如说“老舍之死”这个事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老舍到了文联，在文联经历了一场批斗，后来自杀了。这是“硬”的历史，很简单。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存在，但它背后的很多细节则复杂到你根本无法把它们拼接成一个历史现场的还原图。

比如：（老舍）到文联的时间，是上午、中午、下午，说法不一样，有人说“是我亲眼见老舍下午几点就到了”，有人说是“下午三点到的。我看他从电报大楼那儿走过来的”；又比如说“老舍那天穿的衬衫是白的还是灰的”，有人说“是白的”，有人说“是灰的”；所有人在叙述的时候都说“是他亲眼看见的”，作为叙述者来说，他不可能说自己“我在编故事，我在说瞎话”。

这似乎令人困惑，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多元，对于口述史研究是可以解释的，即不同的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记忆，导致了不同的结果。这三个人里面谁说的是真的，如果有，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三个全是真的，如果那样，就意味着有三个老舍。

十余年间我做“口述历史”获得的最大收获就是，我现在更愿意相信历史背后的那种丰富性、复杂性，远比口述的叙述要多得多。搞历史不是要把历史弄明白，而是要努力让那个历史

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样子，不要结论。

在这些口述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时他们的身份、境遇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事过三十年之后对于那个事件叙述的态度、立场。从口述史理论上来说，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它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一个历史事件，如果你只相信某个个人的叙述，这是带有冒险性的。

老舍夫人和老舍之子都曾经说过，当年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曾经见一个老人在公园的湖边坐了一夜，但是这个老人（指看门人）已无从去找。当老舍夫人去寻找老舍尸体的时候，公园渔场的一个老头告诉她“在那儿”，但这里面提到的可能的证人也已无法找到，除非将来有档案解密。历史就是留下来的文本叙事，没有那个客观实在，历史在发生的一瞬间就不复存在了。你根本无法还原。

中篇：难道他们打捞了三个老舍？

三个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上了同一个人。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只能有一个人真实，如果三个人都真实，就等于那一天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起来的都不是老舍。

口述者之一：原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民警郝希如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郝希如先生家

郑：一九六六年八月时，您正在北京北太平庄派出所工作，那时是什么职务？

郝：是片警，没有行政职务。老舍的事当时都有记录本，但我1968年调离北太平庄派出所后记录本上交了，估计很难找到了。我记得老舍是二十四日出事。“文革”当中事情太多了，这件事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后来每年到这个时间，都登一些文章。那天正好我值班。派出所是轮流值班。我是早上六点左右接到电话的。

傅：这个日子您能肯定吗？

郝：是这个日子。一个男同志打来电话说湖里死了人。我问是男是女，他说看不清楚。我问他在什么位置。他说在太平湖的东南角，离岸有二十多米。我让他在那里等我，我说马上去，得叫他把发现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起来以后，没洗脸，没漱口，叫了一个人看电话，就去了。让那个人先别向分局报，我看看是什么情况。好像是派出所的赵守信，或者是朱军。派出所就在现在的北太平庄立交桥，骑车过来就几分钟的工夫。那个报案的在公园门口等我。老舍死的地方离太平湖公园门口不远。进去，我一看，是个男的。他问怎么知道是男的。我说男的死面冲下，女的死面向上。这个人住在电影演员宿舍院里。我当时看了一下表是六点四十分。

郑：报案人是来太平湖遛弯的吗？大约多大岁数？

郝：是。记不太清了，也就四十来岁吧。详细的在记录本上。养渔场有船。我就去了值班室。当时值班的还没起床呢。是韩文元值班看渔。我说，老韩，你快起来。那边淹死一个，咱俩把他捞上来。我们就划船过去了。我说，看样子岁数不小了。当时拿了一支竹竿，就咱们搭蚊帐那种。还拿了一个消防用的带一个钩的竿子。我说别用钩，钩坏了。用竹竿试试，看能不能给弄走。用竹竿一拨拉，能跟着走。他面冲下，我用竹竿搭着他的肩膀，就划着走。

太平湖有个小桥，我们划过桥到了太平湖西边，桥头那边，水离岸比较近。我们把他放在地上。他怀里还抱着一摞纸，有这么厚吧，很不整齐，就像咱们的报纸折起来这么大，捆着，是宣纸。

根据情况判断，他投水时间不长，顶多一个多小时。纸外面全湿了，里面没湿透多少张。我印象中老舍当时穿的是一个浅色的大褂。过去文人穿的那种到脚面的大襟。穿的是中式圆口步鞋。身上没伤，脸上也没伤，头上也没伤，衣服整齐。这些对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特别重要。我认为是自杀。我看了看手稿，大概是《骆驼祥子》或者是《茶馆》的手稿。写着老舍的名字。全都是墨笔写的。

郑：您一直在现场吗？

郝：一直在现场。

傅：胡洁青第一次来看到老舍尸体时有什么表示？

郝：掉眼泪了。没有大哭。站在那儿挺难受的。胡那种表情肯定也有想法，因为正是“文革”。

郑：您检查老舍遗物时，有没有眼镜、手杖、钱包之类的东西？

郝：没有，都没有。我说了，惟一的就是那些纸。

口述者之二：原北京市汽车修理总厂第四修理厂工人白鹤群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白鹤群家

傅：您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还是25日发现老舍尸体的？

白：24日。确信无疑。

傅：您家住在哪儿？

白：太平湖的北岸。我那天上中班。我每天有到太平湖遛早儿的习惯。

傅：您记得早上到太平湖大约是几点？

白：大约是六点多。整个太平湖一共有两个码头，一个在东湖一个在西湖，游泳的人在东湖，跳湖自杀的人在西湖。我家距离太平湖超不过60米。我那天上中班，下午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半钟。

郑：您说您知道是谁打捞的老舍尸体？

白：我看见有人说是他捞的老舍尸体，我说是我捞的。一共是三个人捞的，另外两个人的姓名我都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站在岸边的是绰号叫麻子李三的，他是柳和居的掌柜；第二个是铜厂李棋王，因为他们老去，我们都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第三个是唐浩澜，我就是通过他知道死者是老舍的。

郑：就是说捞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白：对。惟独唐浩澜知道。当天九点钟，他就告诉我消息了，他来我们家告诉的我。

傅：您当时不是在现场吗？

白：七点钟就完事回来了。我们那时捞上来就算完事儿。到十点多钟知道是老舍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一个叫刘正和，是北京美术公司工艺美术厂的画家；还有一个叫张芳禄；还有关增铸，是对外经贸大学的。我说的这些人当时都在湖边住，都能找的着。

傅：您那天有没有等到警察来？

白：没有。当天最早发现死的是老舍的就是唐浩澜，打捞完尸体，九点多钟，唐浩澜就到家告诉我死的是老舍。

傅：您九点多离开现场，后来还去过吗？

白：十一点多我又去了。

傅：您那时去有没有见到警察、法医？

白：没有。

傅：有没有见到家属？

白：没有。

郑：有什么遗物吗？眼镜、手杖什么的？

白：没有。

郑：您捞的时候也没有？

白：没有。

傅：有没有警察？

白：没有。

傅：就一个孤零零的尸体在那儿摆着？

白：对。

郑：您刚才提到的唐浩澜，他怎么会知道死者是老舍呢？

白：唐浩澜是中国著名的金石鉴定家，解放前大概是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人员，好像是故宫文物陈列所的副所长。他爱人王学敏是张大千的学生。他和老舍是亲戚。

郑：您从什么地方上的船呢？

白：从渔场码头把船划过去的。那时候没有人肯下去把人给拉上来，因为那会儿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我们能对反革命好吗？所以就是拿棍和钩子钩过来的。

郑：那有没有可能碰破尸体？

白：有。腋窝就是破的。其实用的也不是钩子，就是用松树钎子连打带扒拉，因为到岸边起码十几米船就过来了。

口述者之三：北京颐和园派出所退休民警朱军先生

采写：傅光明、郑实

时间、地点：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颐和园派出所会客室

傅：是您接到通报说太平湖发现了尸体吗？您记得这个通报的日子是八月二十四日，还是八月二十五日？

朱：印象当中，我总记得是八月二十三日。可是现在呢，人们都说是八月二十四日。

傅：大概几点。

朱：大概七点多钟。谁值班记不得了，反正值班员说了，太平湖死人了。我说那去吧。那个地

方死的人多了。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就开始上街了，扫“四旧”。那地方死的人是城里边的人多，城外的少。都是自杀的，最多的一天我跟湖里捞上来十好几个。

傅：是您自己去的吗？

朱：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葛林。

傅：照您的说法，郝希如根本就没去？

朱：他没去。当时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他值班，我记不很清楚。如果说他们对这事很清楚，有可能是他值班。当时我和葛林骑着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太平湖。

傅：那天您发现老舍尸体的时候，是在湖的什么位置？看到之后，是您又叫人去捞的吗？

朱：我上渔场找船。

傅：您刚捞上来的时候，尸体是仰面朝天，还是趴着？

朱：仰面。

傅：您跟胡洁青有交接吗？

朱：对。

傅：胡洁青是什么时候来的？您又是怎么确定这个人是老舍的？

朱：当时捞上来之后，有个演毛主席的特型演员，姓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反正老见面。他在马路西边原来老的电影学院，这地方归我管。所以一些老师、演员当时我都认识。这个特型演员，那天到太平湖玩去了。我们一进太平湖东门，他就匆匆走过来说，这死的人是老舍。

傅：他在你们一进东门的时候就说死的人是老舍？

朱：对。老舍我们从来都没见过，仅仅是听说过。但他说见过，就是我们捞的时候，这人一直在。

傅：可在没捞上来之前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老舍呢？

朱：人家见过，这尸体浮在水里，他能看得见。

傅：那他怎么知道的？

朱：咱就不好说了，反正他说我见过他，我认识他。我说我们可不认识，咱不能说这死的人是谁。

傅：就等于说这位特型演员是在没捞之前，就说这人是老舍。

朱：我们没敢确定这个人是不是老舍。捞上了人，他拿着个钱包。

傅：胡洁青在看到尸体，并确认是老舍之后，有什么反应吗？

朱：没表情，很严肃，一点眼泪都没有。

傅：遗物里有什么东西吗？

朱：我记得当时在河边只有散落的一些稿纸。字不多，是毛笔字，就是一般的纸。印象当中写的好像是香山红叶之类的内容。

郑：您有没有统计过，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湖自杀的大概有多少人？

朱：死了有几十人吧。八月前后那一段死的人不多，八月二十四日，就老舍一个。那时不像现在在工作上这么规范，那时有记录的拿个笔记本哗哗这么一写就完事了。

下篇：弃世的老舍与太平湖记忆

老舍投湖至今是一个谜。

有人称看见他四十年前的那个八月二十四日，在太平湖边一直坐到黎明前，但是那位“目击证人”已无处觅踪；无数人在猜度他在太平湖畔最后一夜的思考，正因为无从了解他的内心，从而生出更多的想象空间。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有人把老舍的遗体自太平湖中打捞出水起，喜爱他的人，就一直被多个版本的目击和见证所还原的历史困扰着。老舍决意弃世的那一天，被无数个“当事人”和“亲历者”复原成了他们本人意识中的老舍。

老舍为什么“弃世”？仅仅是因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被红卫兵殴打吗？在后来见诸文字的报道和口述史中，“扬起的皮带和铜扣、从额头流到眼角的鲜血、推搡……”的现场里一位六十七岁刚刚走出医院的老人被打倒在地。但这些肉身上的痛苦尚不足以使这位文艺老者放弃整个世界。

这一天，被记录在案的还有：一位“站了出来”的同事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老舍又遭到第二次痛打。

但是这种揭发并不足以摧垮他的世界，还有更鲜为人知的史实：在老舍回国后的五十年代初，他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这一细节对研究老舍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很重要的依据。在他与其在美国的版权代事人的通信中，老舍同意加入美国作家协会并每年缴纳美元会费。当然，这一活动自然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自由主义精神情结可见一斑。

目前的研究对于老舍身上浓重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几乎被忽略了。他的穷人出身与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是那么的吻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时回到北京——是年十月他接到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信件。而当时他正在美国养病。

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迫切心愿、龙须沟的实地调查、对党的热情歌颂、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使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把他和胡适、沈从文、傅斯年这些主流的自由知识分子进行类归。因此，人们把他在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情结、那种超阶级反内战的态度顺理成章地忽略不计了。

此后，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眼中看到了什么呢？

一九五四年，胡适被批，俞平伯被批；一九五五年，胡风被批，“丁陈反党集团”出现；一九五七年，他的朋友，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吴祖光被划为“右派”。

老舍在距弃世不到半年的一九六六年春天，还主动跑到顺义县陈各庄，为宣传科学养猪写出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

剧作家苏叔阳提到舒乙讲过的一个例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怀着极大的热情，想

参加农民艺术团，去访问农民。但是没让他去。此事使老舍彻底失望，觉得党已不再信任他了。

苏叔阳很干脆地说：他看不到出路。

老舍回国后，一直是人民艺术家，他规规矩矩，怀着要报恩的感情，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走。老舍一直用生命去寻求他所热爱的文化，但在“文革”一开始就遭到了“横扫”，面对这些现实，自尊的、以中国文化为生的老舍，看不到出路。

老舍在湖边徘徊了一天一夜，在25日的打捞现场上，人们看到很多写过字的纸扔在湖面上，有人称：上面写的全是毛主席诗词。老舍先生追慕崇高，所以先生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清高的表现。当他觉得活下去的理由已不存在了，要么跟着别人走，起哄；要么不跟着，那还是死。活下去已经没意义了。

老舍在选择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时候，也选择了走水路。太平湖接纳了这个冤屈的灵魂。离太平湖不远的西南，有个叫葡萄院的地方，是老舍母亲去世时的旧居；再从这里往西北蓟门故里，留着老舍父亲的衣冠冢。这湖水，使一家人再一次三位一体地存在。

在这里，老舍把躯体交付给湖水，把性命交还中国文化，把信仰收归自己。

□ 原载《新世纪周刊》

~~~~~

#### 【史海钩沉】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 纪坡民 •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听说，在省委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只是个“八把手”。

虽然我父亲于1963年已调到省委担任上述职务，但因为1964年商丘地区遭受水灾，他又到商丘兼任了地委第一书记，基本在商丘地区主持救灾。救灾工作于一年后基本结束，按省委分工，他又担任了全省“四清工作总团”的团长，负责具体指导全省的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8月，文革已经开始了，“十六条”也公布了，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呢。

1966年8月，河南省委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纪登奎才调回省委，担任了省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从这时起，他才介入文革的事。

那个时候，省委文革小组的所谓工作，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拨又一拨地接待川流不息的群众组织，还被“革命群众”揪来揪去，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检查“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听父亲说，文革开始时，因为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并不在省委工作，所以“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他本人什么事，把他揪到各单位去，只是“替省委作检讨”。而他当时的思想，不仅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也是“很不理解”的，而且，“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在当时早已被党中央“定性”了，纪登奎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只是个形式，是不是错误路线，要看工作组工作的内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顽固”和“保守”的。



1966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新市委了，文敏生接替他主持省委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在省委和文敏生的领导下，仍然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在非常混乱与困难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局面。

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出问题”了，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以讹传讹地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这里的历史缘故还有，这些省委领导“大跃进”时跟着吴芝圃搞“极左”，1961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对我父亲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拉上我父亲一起“站出来”，带头打倒文敏生。我父亲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父亲拒绝了戴苏理拉他“起来造反”的意见。

1967年初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河南的形势更乱成了一锅粥。河南省委终于瘫痪了，我父亲也于1967年1月被关押起来了，家里人不仅见不上面，也不知道他关在那里，连是死是活也没有个消息，只有在郑州开批斗大会时，家里人看到造反派把他拉到会场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说法，“纪登奎坐了一百多次飞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将近半年。

人们一般认为，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因为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这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连“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他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听说的。

1967年1月，毛主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不久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河南省委瘫痪了，军队接管了政权；当时，主持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是政委何运洪，他实际掌握着河南全省的局面。

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把“二七公社”镇压下去了，抓了好几千人。到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先后到河南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了。不过，纪登奎仍然被关押着，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道。

大概是196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的时候，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后来纪登奎讲的这番话，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被红卫兵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而且到处传抄，搞得全省都知道了。不过对这些情况，还被关押着的纪登奎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纪登奎对解放军报记者的这次谈话，在社会上却搞得很轰动。因为“二七公社”当

时正在“受压”，被抓了好几千人，看到纪登奎的谈话，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那时候的说法，对纪登奎是“路线出感情”吧，就认为他是个好干部，那时叫“革命领导干部”。就这样，纪登奎就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个话在精确程度上还稍有一点偏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因为造反组织的支持，纪登奎才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但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1967年3月中旬，河南省委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省军区主持的会议上，由省委一位书记赵文甫率先发难，另一位书记戴苏理紧跟着表态，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公开起来造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反了。因为这些省委领导人当时认为纪登奎是同刘建勋、文敏生站在一起的，所以把纪登奎也捎上了。在社会上，这些省委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同“二七公社”是对立的。所以，1967年上半年，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喊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

1967年4月以后，因为河南形势动荡，中央让河南省军区到北京汇报文革情况，还要求河南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也一同到北京参加汇报会。这时候，在北京参加汇报会的“二七公社”的代表，便提名纪登奎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到这时，纪登奎仍然在河南关押着，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已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到1967年5月份了，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好几次了，周总理问，你们“二七公社”一派的领导干部是谁？怎么还没有来参加汇报？这时，“二七公社”的代表也着急了，让他们在郑州的人赶快想办法。后来，他们“二七公社”的人，终于打听到纪登奎的关押地点，深夜采取行动，把纪登奎抢出来了；而后，又把他送到郑州铁路局，因为怕对立的一派中途拦截，让他装扮成司炉工，钻在火车头里，还用煤把脸抹黑了，送到了北京。

到了汇报会河南代表团驻地西苑旅社，我父亲才成了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若仔细分辨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打个不大准确的比方吧，纪登奎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倒是和辛亥革命时黎元洪的情况有点相似：辛亥革命时，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官兵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当上了“革命领袖”的，在黎元洪看来，他是大清朝的将领和臣子，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当而且死活也不愿去当那个该当“灭门之罪”的“乱党”和“草寇”。而文化革命中，纪登奎则是“二七公社”从关押地点把他抢出来、乘火车头送到北京的中央汇报会上，才当上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同黎元洪的情况还有点相似的是，在纪登奎当时的观念里，他是正儿八经的“党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要支持造反组织，去当他们的“后台”。

说起来，那个时候，无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或者在中南局的陶铸和王任重那里，还是河南省委刘建勋和文敏生手下，纪登奎都是相当得宠的“大红人”，又是刚提拔到省委，心劲

儿足得很，正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忙他的“党的工作”。那个时候，纪登奎既没有在党内受排斥、坐冷板凳，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迫害，比如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什么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历史恩怨的理由，要起来“支持造反组织”去夺省委领导的权。

而且，纪登奎作为一个地方干部，当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种事情，那时都是在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上、在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都是中央知情、认可、甚至“赶鸭子上架”的，并不是他纪登奎“阴谋策划”、“秘密串联”、“煽风点火”，要起来“造反夺权”。

当时，在北京参加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的，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而实际情况，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的格局。

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两个多月，周总理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八次。到1967年7月25日夜，周总理讲话，对河南文革问题表态：

“二七公社”，被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这意味着中央支持这一派；

“河造总”，被称为“犯错误的造反派”，这一派属于“团结对象”；

“十大总部”，则被称为“保守组织”，周总理还有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十大总部应当分化瓦解”。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中央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表态，是一种典型的“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在当时，这也是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对其他几个省的文革问题，中央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处理的。

最终的结果，军区政委何运洪挨了批评，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重新回河南任组长，空降兵15军政委王新担任副组长，我父亲也是副组长。后来成立河南省革命委会时，我父亲是副主任。

1967年7月底，我父亲回河南时，又成了省革筹的“当权派”。那时，省革筹的所谓工作，就是解决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主要是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让分裂对立、文斗加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总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政权组织起来、建立秩序、恢复生产。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是由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省革筹工作组到现场去，当时河南全部十个地市、一百多个县以及大型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纪登奎带队去解决的。父亲后来对我说：“在省革筹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工时，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专门解决全省各地的‘老、大、难’问题。”说到这里，他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这领导班子里，哪里有这么分工的？”

对解决这类问题，纪登奎似乎摸索出了一套办法。记得还是1967年底，父亲从豫北回来，很得意地对我说：“在豫北，两个月时间，我解决了三十多个县，一天一个县。”

据说，这些情况，都被新华社记者用“内参”发往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后来到“九大”时，纪登奎被毛主席提拔到中央，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父亲在八十年代“忆旧”时对我说：“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和群众在一起厮混，还能在群众运动的混乱局面中解决问题。”

当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时纪登奎在河南解决这类问题，自然都要按照中央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这一段时间，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才算是名符其实了。

不过，如果认真研究文革史的话，应当注意到，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后，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同原先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了，从1967年夏秋之际开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有了变化：

此前，我们可以称为一种“倾斜性”的方针，政治表态，是“支持左派”，在组织上，“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时，则要求以“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河南之前的几个省的问题都是按这种方针解决的，河南问题也是按这种方针处理的。而此后，则可以称为一种更为“平衡性”的方针，对各省文革中的各派，政治表态不再有“左、中、右”的明确区分，在组织上，也不再要求“左派”为主或者占优势。

如果纯粹从“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看，中央解决各省文革的方针，改变“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由“倾斜性”的方针改变为“平衡性”的方针，不仅相当重要，而且比较合理。这个变化，不仅作为当时解决各地文革问题的方针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重新审视我们党从建国后到文革前的治国理念，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说起来，这种“左、中、右”的思想模式，也是由来已久了，实际上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如今名气很大的“反右斗争”，也都是这样。

以文革的情况来说，如果我们不是仍然陷在当年“派性”的感情旋涡里，而是能够比较冷静、公允、客观和理性地审视当年的情况，这种“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和“倾斜性”的方针，毛泽东是这样，刘少奇也是这样，所谓“五十天的反动路线”是如此，后来的“批判反动路线”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不同。毛泽东“批判反动路线”和刘少奇“五十天反动路线”真正的区别，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心目中，“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恰恰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五十天反动路线”时期的“右派”，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却成了“左派”。

我们在文革时代看到：正是由于对应当“依靠、团结、打击”的“左、中、右”在认识上是对立的，文革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在文革实践中演变成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也就是文革时代最常见的“两派”的“派性斗争”，并且由“文斗”到“武斗”、搞到“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

中央对各省文革问题的处理，由“倾斜性”方针向“平衡性”方针的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问题、由于什么机缘而发生的？我想，可能与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有关。

1967年夏，湖北省两派矛盾激化，武汉更是十分尖锐，“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中央发布了严禁武斗的《六六通令》，可是不顶用，武斗反而越演越烈了。到7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带队，领着一大批党政军要员，到武汉开“现场会”解决问题。可是，中央在解决武汉文革问题时，不是实行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先对各派平等对待，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针对具体问题，再对有关各方的是非曲直作出评判；而是实行一种“倾斜性”方针，“下车伊始”，甚至人还未到，在北京已经定下的方针就按照“左、中、右”的思维模式，确定了解决问题的结论性意见。这个结论性意见，认为不应当把“钢工总”打成反革命，为此而批评武汉军区领导，应当说还是有道理的；可是，将其中一派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而将另一派称为“保守组织”，则是“倾斜性”方针的典型表现。

而且，就这么个方针，解决的程序也有问题，没有先把军队“老总”们的思想做通，就公诸社会了；于是，立即引起“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不满，结果闹出一场大乱子，差点演成一出共产党版本的“西安事变”。可见，处理政治问题，也是一门学问，违背了“客观规律”即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不符合人们普遍认可的常情常理，不仅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人们会不听，甚至他老人家“御驾亲征”，也不灵光了，照样把事情办砸了。

当然，自1967年夏秋，作为中央解决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这是一回事；各省在处理本地文革问题时，是否也能够实现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在各派之间做到比较“平衡”一些，则是另一回事。许多省的情况，文革中两派最后的结局，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政治与组织上对某一派的“倾斜”，这主要取决于当地领导者（开始是党政领导后来是部队首长）的意志。而各省发生这种“倾斜”的方向，往往又同前一段时间中央“倾斜”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样看来，前一段时间中央实行“倾斜性”方针，大概也是针对各地的“倾斜性”的一种“校正”，或者用一句更为流行的话，叫“矫枉过正”。尽管如此，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变化，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显然变得比较合理了。

我不是研究文革史的，不过我的印象，中央实行这种“倾斜性”方针，河南大概是最后一个省。河南省革筹在处理本省文革问题时，自然也是执行这种“倾斜性”方针的，如成立省革委时，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名额，“二七公社”为主，“河造总”为次，“十大总部”则没有份儿。

据我所知，我父亲当时很密切地关注着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而且，研究政策历来是他的所长，在这些方面思想也相当敏锐；纪登奎看到了中央方针的这个变化，而且在处理河南文革问题的实践中，对原来“倾斜性”方针作了一些调整和校正，使之略加“平衡”一些。

比如，对“十大总部”，本来周总理已经讲过“应当分化瓦解”的话，可纪登奎强调：虽然作为全省的群众组织，“十大总部”已经解散了，但“十大总部”下属的基层群众组织，仍然可以参加“大联合”和“三结合”，在基层革委会中占有席位。

这里我插一段故事，也许可以反映我父亲的政治理念。记得是1967年秋，我回家探亲，有一天，有我，还有我妹妹和她的同学，聚在一起闲聊，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人们聊天，没有别的话题，都是谈文化革命；大概是说起了戚本禹，那时河南人一般都认为，戚本禹支持“二七公社”的态度最坚决，主要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北京汇报结束时，“十大总部”对中央的表态很不满意，就围攻戚本禹，非要他表态：“十大总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戚本禹怎么说，他们也不服，于是恼了，就和他们对着吵：“十大总部是保守组织，是老保！你们就是老保！”父亲听我们说了一会儿，慢悠悠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拥护戚本禹那些人，赞成他们的话。”听了父亲的话，我们一愣，记得是我妹妹的同学问他，“那你赞成谁的话？”父亲说，“戚本禹那些人的话，讲得不行。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是觉得总理的讲话，比较靠得住一些。”

记得当时还说到一些中央领导对“七二〇事件”讲话时，痛骂武汉“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还把“百万雄师”说成“百完熊尸”等；听我们说得很热闹，父亲很不以为然地说：“把百万雄师、产业军骂成那个样儿，都是在中央工作的人了，怎么能那样讲话呢？总理的话，就不是那么个讲法。”不记得是谁插话问，“那为什么？”父亲接着说：“周恩来是总理呀！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好，四川的‘产业军’也好，还有河南的‘十大总部’，有那么多群众呢，你把他们骂成那个样儿，讲的那么凶，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对总理来说，造反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不管怎么说，这天底下的中国人，还不都是他周恩来的老百姓嘛。”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都相当偏激狂热，我也一样。父亲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也使我的观念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不像原来那样，对文化革命时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持那么黑白分明的看法了。

不过总的来说，作为省革筹的成员，纪登奎在处理河南各地文革问题时，基本上仍然执行的是中央确定的“倾斜性”方针。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基本上还是对的。我想，这也是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对他有这种看法的原因。

这里顺便插几句。我认为，中央处理文革问题的方针由“倾斜性”向“平衡性”的转变，也正是所谓“王、关、戚事件”的一个政治背景。1966年底，在毛泽东看来，陶铸的想法，妨碍了他将文化革命全面推向高潮，因此，陶铸在文革初期提拔到中央不到半年，就让毛泽东“拿掉”了。到1967年秋，可能是为了给文化革命狂热的势头“降温”吧，“倾斜性”向“平衡性”的方针转变，由于弯子转得太急，王、关、戚也就从文化大革命的战车里甩出来了。

说起来，为了纠正和扭转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而在党内找个“代表人物”来批判，引导党内和社会的思想潮流，这也是我们党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司空见惯的做法。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搞的文化革命同我们党以往的政治运动，在对“左、中、右”的态度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但在情况紧急时，避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失控，为大局计，主要是稳定军队，这种老办法，他也会拿来一用。

“王、关、戚”如果觉得冤枉，那陶铸呢？和陶铸相比，他们只是小人物。

1967年秋，毛主席“南巡”，那一次叫“巡视大江南北”。到了郑州，接见河南省领导，他和纪登奎有一段谈话，当时传得很广、名气很大。因为过去和纪登奎很熟悉，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称他“我的老朋友”。如今有些人认为“老朋友”的称呼，毛主席好像有什么特别含意似的，其实这只是主席很随便的一句话。

毛主席接着就问：“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

纪登奎说：“这对我大有好处。”

当时，毛泽东还问，“坐飞机”是个什么样子？纪登奎站起来比划、作示范，毛泽东也跟着学“坐飞机”的样子，弯腰，手向后举，还问“是这样吗？”毛泽东问他，“坐飞机”什么感觉？纪登奎说，“啊呀，腰酸得很，感觉就和割麦子差不多。”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好像就是那么瞎扯。

后来，八十年代了，父亲对我说起那一次毛主席和他的谈话：“那次和主席一见面，我就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主席很高兴。”

父亲接着说：“那一趟南巡的时候，毛主席见了不少他过去的老熟人，有长征时的警卫员；这些老熟人，一见到毛主席，咕咚一声就跪下了，接着就是号啕大哭，然后就诉说他们文革中间受冲击、挨批挨斗、挂黑牌、‘坐飞机’那些事，觉得冤枉得不行，他们受的那个委屈也确实大了。那次南巡，主席见到的那些老熟人，大概都是那个样子。可毛主席不大高兴，他不喜欢他们那个样子。”

父亲说：“毛主席见我的时候，我和他开玩笑、说笑话，他很高兴。后来把我提拔到中央，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认为我在文化革命中能够‘正确对待群众’，那个时候，毛主席很看重这一条。”

可是后来，许多老干部对纪登奎说的“大有好处”这句话、还有他后来讲的“三个正确对待”（就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很不满意。这当然有道理，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纪登奎却说“大有好处”，而且还要“正确对待”，那不等于说，他们受那么大的罪，是完全应该的！难道今后还要受那样的罪吗？所以文革结束以后，纪登奎写检查，还专门检查了他当时说的这几句话。

这桩“坐飞机”的事，后来还有点故事。文革结束后，河南又批判纪登奎时，说道：“纪登奎说他文革中坐了一百多次飞机，是欺骗毛主席、欺骗党和群众。实际上，据统计，文化革命期间，纪登奎‘坐飞机’，只有九十七次。”这是1978年贴在省委门口的大字报，我亲自看到的。好玩吧？

这个“倾斜性”和“平衡性”的问题，后来还有点余波，也有点意思。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毛泽东亲自点名，由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作大会发言，他可以算是因为“支持造反组织”，当了“领导干部典型”了。

可是，大会发言后，却闹了点小“风波”：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中央按照“倾斜性”方针成立革委会的几个省，可能是六个吧，这几个省的革委会主任，父亲说，“就是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还有谁？有没有张春桥？他没有讲。他们几个跑到纪登奎住的房间批评他，提的意见，主要是对纪登奎在大会发言时讲的“一派不行，两派才灵”这句话很不满意。父亲说，“他们几个人，把我围攻了一顿，可是，我拒绝了他们的批评意见。”

由此可见，对处理文革问题的“倾斜性”方针，纪登奎还是有所修正和保留的。如果允许我替父亲做点辩护的话，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这“典型”二字，还稍有些可以商榷之处；从“九大”期间因为纪登奎的大会发言而“被围攻”的不大的“风波”来看，作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纪登奎还不算很“典型”，而他说的“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他们那些人”，可能更适合当这个“典型”。

毛泽东在“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中，没有选择刘格平、潘复生、王效禹等人，而挑了纪登奎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大概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倾斜性”方针和“平衡性”方针的斟酌与反思，反映他在处理文革问题时思维方式的转变。

1969年4月党的“九大”时，纪登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两个月以后，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工作。我父亲在中央期间，花费很多精力管的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全国各省、中央各部门和一些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

这些问题的大致情况都是，中央每发生一次大的“风波”，文革前期的“派性”问题就被触发，又闹起来了，两派的群众组织头头自然是“闻风而动”，支持这些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也分成两派，当地的军队领导部门和驻军部队首长也掺和在里头，不仅“三结合”成了“三凑合”、“三磨擦”，而且“军、干、群”各自又都分成两派，矛盾尖锐得很，闹得一塌糊涂，党委瘫痪，政府办不成公，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学校上不成课，影响到社会秩序也乱得很。

这时候，我父亲的角色变了，成了“中央领导人”了，周总理太忙，后来又病了，他说纪登奎是个“壮丁”，于是，解决这些问题就交给他来办了。

听父亲说，文革时代他在中央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文革问题，他直接参加解决过的，至少有二十个省，许多省的问题，都不止解决过一次，起码是两次，有的甚至是三次。他解决各

省的文革问题，第一个省是山西，1969年7月；最后一个省是浙江，1975年7月。

对各地的文革问题，纪登奎解决的次数多了，似乎也从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掌握了一套方法；大体上的程序，就是让那些出问题的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到北京来，找个宾馆办“学习班”，听他们谈情况、说是非、争论、有时吵得很厉害；然后弄清情况、分辨是非，由中央领导人去讲一篇话，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个省的领导班子，回去以后就基本上又能工作了。有一次，我问他：“山西问题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解决的？”他说：“山西的问题，和南阳的问题一样。解决南阳问题，用了七天；解决山西问题，用了23天。”可是，南阳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还是什么也没有听明白。

文革结束以后，清算毛主席的错误，纪登奎自然难辞其咎，他在党内被批判，后来又下台了。共产党过去的老规矩，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自然是翻箱倒柜，他过去管过的事、处理过的问题，事无巨细，都要揭发批判，统统过一遍。纪登奎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事，自然也不例外要受此对待。我父亲说过：“我处理过的各省文革问题，后来大家揭发批判，对我提了意见的，有一个半，一个，是河南省，半个，是山西省。”说这话的时候，是八十年代，父亲下台好几年了，时过境迁，父亲说起来，也比较轻松些了。”河南的事情，我还知道一些，可山西那“半个问题”出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由此看，纪登奎解决各省文革问题，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处理的还算是比较公道的，对两派问题，当时他的几句话，如“一碗水端平”、“折墙平沟解疙瘩”、“两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等，基层的干部群众反映还不错，也可以说，他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平衡性”的方针。当然，在我们党那么多的功臣战将里，纪登奎的资历相当浅，对那些纠缠不清的文革问题，大概他要费许多口舌、在错综复杂的“是非窝”里讲出几条能说服人的道理才行，光有几句“原则性”的“中央领导指示”，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至于像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地位和气魄，以他的“倾斜性”方针，对抗各地党政军大员的“倾斜性”方针，以一人之力就可以抗衡整个党的力量；纪登奎在我们党那么多老资格面前，只是个小人，即使他“比葫芦画瓢”想学毛主席的样子办事，也根本没有那个本钱。

河南文革期间的事，还有一件，相当有点蹊跷。

文革期间的1967年上半年，本来河南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他们三个人被捆在一起打倒，是同样的处境。可是，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刘建勋和纪登奎作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敏生却被中央作为“走资派”点了名，遭受了许多年的坎坷。

有些人因此责备刘建勋和纪登奎，其实，这种人事安排，都是中央决定的，刘、纪他们当不了这个家。据说，是当年一位中央领导人对毛主席说，文敏生这个人，“貌似忠厚，内藏奸诈”，毛主席相信了，于是文敏生就当上了“走资派”。毛主席还说，这位中央领导人并不庇护自己的部下，意思是不搞“宗派”的意思。

不过，文革时代的事，祸福相依，河东河西，也难说得很。“貌似忠厚、内藏奸诈”这句话，文革时代自然让文敏生倒了霉，可后来对他却成了好事，文革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邮电部长。如果那个时候，文敏生和刘建勋、纪登奎一块参加“三结合”，还不一样得陷进文革的是非窝里，那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可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还有这么件事，也值得一提。到1986年了吧，纪登奎已经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下台好几年了，有一天，何运洪的儿子来北京办事，到家里来看望他。我父亲有点意外，坐下



聊天，先对他说：“你爸爸身体还好吧，替我问候他。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批判过他，对不起他，应当向他道歉。请向你父亲转告我的意见。”何运洪的儿子说：“你们之间过去那些事，就不用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话了；那个时候，你批判过他，他也批判过你呀，而且他还把你关起来了嘛。”说起文革时代的恩怨，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气氛挺轻松的。

何运洪儿子来访的事，后来父亲对我提起过好几次。何运洪和我父亲文革前可能也认识，他也是老革命了，都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前世无怨，后世无仇，对他们文革时代形成的恩怨纠葛，能够冰释前嫌，父亲显然感到很高兴。何运洪这个儿子挺有水平的，可惜我不认识他。

文革结束以后，1979年吧，我在河南省机械厅工作，那时河南正在批判纪登奎文革时期的错误，机关支部开会，要求每人都要发言表态，我是党员，而且事关我父亲，没有个态度也躲不过去。我说：“纪登奎的错误，别的事情我不了解。不过，文革期间他在河南工作时，确实有‘支一派压一派’的问题，他这方面的错误，在很长时间内对河南的工作都有很不好的影响，我自己在基层工作时，就有这方面的体会，也听基层干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

我的发言表态，说不上“认识深刻”，要是在偏激狂热的文革时代，就这么几句话，恐怕是“过不了关”的。不过我这些话是诚恳的，出自内心。

2008年3月 于北京家中

□ 节录自作者《读书札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兼答张胜同志：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

## 【不堪回首】

“文革”如同埋在心中最为疯狂的奥斯维辛

• 高 瑜 •

我于1944年出生在大后方重庆。我的父母亲都是优秀的知识份子，母亲属于“一二九”一代，父亲属于“五四”一代。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很早，据《中国共产党河南省长垣县组织史》记载，“大革命时期，长垣县就有了共产党的活动，1927年春，共产党员郭汾第（字代庵）、于绍孟（字舒卿）、高韶亭（高绍堂）接受党的指示，从河北省第七师范学校（设大名，亦称“大名七师”）返回长垣县城。在青年知识界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发动各界群众迎接北伐革命军，支援北伐革命战争，形成了地方国共两党组织合作开展活动的局面。”这是有史可查的长垣县最早的中共的活动，高韶亭就是我父亲，他加入共产党，肯定要在1927年之前。

如今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人是被排除出去的。这是由于整个五十年代，更由于“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我自然不能幸免。我于196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这一年是因国力濒危，教育大大紧缩的一年，高校只招收10万人，比相邻的1961年、1963年都少20万人，是建国以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我一直向往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时是全国惟一的新闻专业）也被从招生简章中砍掉了，我只好报考了中文系。我还记得，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去看望我最敬爱的一位老师，晚上她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一同等候汽车的陌生人，知道我考上了大学，都涌上来，非常热情地向我祝贺。

集中了全国最优秀学子的1962年的大学，营造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浓浓的政治气氛，我

同班的30名同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村，他们把进入大学看作是跳过了鲤鱼变龙的龙门，是光宗耀祖的开始。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对于当年我这个从干部子弟小学毕业升入北京十大重点中学的城市女生却格格不入。我从父母身上汲取的是独立自主的精神营养，从小养成特立独行的性格。我父亲在我11岁时就病逝了，母亲对我们的要求颇为宽松，只要有个好分数就可以了。在唯分数论的中学环境里，我从容自如，把考试作为最有兴趣的事情，我为每次考试总能赢得最高分而更加热爱我的老师和学校。就是面临1962年高考那样严峻的形势，我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我甚至安慰母亲：“我要考不上，谁也考不上。”因此我把考入当年在全国高校招生简章上排名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仅因为对上大学抱有不相同的目的，我已成为潜在的被批判的目标。大学实行学生自治，班级内的事情不是由班主任决定，而是由班级的学生干部、团支部决定，而这些干部职务几乎都由农村来的同学担任，他们部分人身上有一种远远超过我的政治狂热。在中共用“工具论”控制思想的年代，这种政治狂热表现为，要表现自己是驯服的，就要拿别人做“斗私批修”的活靶子。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从长沙来的一位女同学和高年级一男生谈恋爱，在我们班上就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受尽批评和凌辱，直到毕业都抬不起头。到了毕业时我们才知道，批斗她最厉害的勇士中，有好几个人早在农村娶了老婆，甚至有了孩子。我大一暑期到农村参加劳动，一次晚饭时，发现中午的剩饭上被苍蝇下了一堆蛆，不假思索地就把剩饭倒掉了，结果我们班级当晚就在宿舍里摆开战场，不问情况采取突然袭击方式开了我的批判会，批得昏天黑地，言词最尖刻者始终是那几个人。这次批判对我刻骨铭心，以致很多年后，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泔水桶里被人倒掉的饭菜，我都会忆起我倒掉的那碗剩饭。对我们两个女生的批评，只能算做小菜，一位广东籍男同学，在日记里用诗歌写了家乡在“三面红旗”下民不聊生的境况，竟被班级和团支部的干部打“小报告”告到校方，将他打成了反动学生，毕业时留校察看，不分配工作。日常学习中，因为一句话，一个观点，被上纲上线，被打成反动学术观点，更是家常便饭。总之，左的年代，左的思潮，阶级斗争为纲，在我们的班级里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一、大二我们只念了两年书，大三就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一年，后来改称为“四清”。升入大四，系里给我们班派了一位政治辅导员丁子霖，她没有给我们兼课，只组织我们参加社会上的学术大批判。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学习的正式课程已十分淡漠，但丁老师领着我们批判“反动电影”《北国江南》、《红日》、《舞台姐妹》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大四第二学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全身心地投入。围绕打倒系党总支书记马奇和政治辅导员丁子霖，我们班级分成两派。我和一些同学不同意将不满三十岁的普通党员教师丁子霖作为揭开语文系盖子的目标人物，我们这一派人在班级里是少数，只占三分之一，“小资情调”者、执有“反动学术观点”的人，“反动学生”，还有一名插班进来的“摘帽右派”都是“保丁派”。“倒丁派”则包括绝大多数的班、团干部，他们社教之后都成为中共预备党员，都是被丁老师发展入党的。我们少数派中只有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就是班长林锦红。我们在全校范围内属于学生中的多数派组织“三红”，对立面属于另一造反组织“新人大”，他们学生占少数，教职员工占多数。

我们班的“新人大”斗争过丁老师之后，就忙于到校长、系主任、教授家里去抄家，据我了解，我们班的“三红”同学没有一个人参与抄家。1967年5月底，“三红”将彭真等人揪到人大批斗，我作为新闻组的成员，可以出入主席台，当他们被押来的时候，我看见彭真低着头，哈著腰，为应付下跪，还穿著一条破旧的蓝棉裤。当他从主席台上被揪下来，扔到临时围起的席棚中的时候，他大汗淋漓，浑身哆嗦着，瘫在地上像患了急病，我给他端来一茶杯白开水，递到他的手上，他狂饮之后，连连给我举手敬礼，口里还说：“谢谢姑娘，谢谢你的好心。”这时在我眼前的彭真完全和我在西安郊县搞社教时的陕西老贫农一模一样，尤其是说话的语调。

我在西安北斗村搞社教时经常给我们依靠的一个贫下中农“根子”——也是村里的“五保户”——买吃的用的，这位七旬老人就到处讲我“心好”，结果我受到“四清”工作组里公社干部的批评，同组的语文系一位老师还给我上纲上线，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是革命的腐蚀剂。”

我给彭真端水，从没有想过后果，只是出于给一个老人，他当时最需要得到的帮助。这已经成为我少年时已形成的行为的出发点。好歹我没有受到追究，也没有被对立面掌握，否则我痛挖“思想根源”，要一直挖到幼年听到的童话故事。

我的母亲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站到了这场革命的对立面。她从来拒绝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记得一天我读高三的弟弟回到家，满身满头都是土，母亲问他怎么弄的，他说去斗学校旁边的一个地主婆了，和同学一起把她家的房扒了。母亲当时就说：“你们这是无法无天的土匪行为，以后决不能再干了。”她给了我弟弟钱，让他马上去外地串联，躲开了北京的抄家风潮。但是这股腥风血雨很快就降落到我们自己家，1966年8月底，一个和母亲结有宿怨的书记的老婆，叫来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把我家也抄了，所有的书籍衣物都被抄走，桌椅橱柜被砸，被褥被撕烂，还撒上酱油和醋。当我从学校赶回家里，看到披头散发的母亲，我们没有抱头痛哭，我只记得母亲对我说：“这是无法无天的土匪行为，红卫兵都是土匪。国民党也干不出这种事！”母亲一生有两次将共产党和国民党作比较，一次是“文革”，另一次是“六四”。

大概是大学和中学的环境有别，因为抄家我被同学打成“黑五类”，但弟弟却扯起红卫兵的旗帜保护自己和家庭。1968年，整整推迟了一年的毕业分配总算来临，我被分配到山西大同县一所公社中学当教员，弟弟则参加空军去了广东。

一场延绵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需要人抛开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审视全局。1966年之后，全国高校几乎都变成杀人的屠场，中国人民大学每个系都有死于非命的老师。教我们作文的李老师竟拿烧红的炉条穿透自己的心脏，死在关押他的原来的系办公室里；教过我们俄文的高高大大的阍老师，年龄还不足四十岁，也自杀了；他们都死于对这场革命的绝望。相邻的新闻系著名教授蒋荫恩，1968年3月27日被“新人大”抓去，4月初的一天受到外调的《贵州日报》造反派的殴打，第二天，看守他的三名新闻系的学生发现没有动静，就撕开糊满单人拘留室门窗的大字报，发现他已经吊死在屋子里，这三个学生竟然拖着他的双脚往外拉，口里还喊著：“这个反动的家伙，把他拉到大操场请罪。”当时被关在放扫帚的楼梯间的方汉奇老师听到“嘭、嘭、嘭……”富有节奏的清晰的声音，正是蒋教授花白的头磕在一阶阶楼梯上的声音。后来听说方汉奇老师向军宣队申请买了一张马克思的像贴在扫帚间驱鬼。蒋教授被曝尸两天后，才通知他的儿子去收尸。我曾在一个清晨，远远看到蒋教授的两夫人（是亲姐妹）一同被叫到新闻系楼头的小松墙边训话，她们年龄与我的母亲相仿，气质也相像，虽然穿着破旧的衣服，一眼就看出是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女性。我听见新闻系的人骂她们：“成天穿着破衣服，装蒜！给社会主义抹黑。”“文革”中的很多事如今都淡忘了，但这对刚刚丧夫，应被我们称作师母的女人受辱的情景，我没有忘记。校园中最后的屠杀是学生之间的武斗，每次大的武斗，几乎都有人死亡。我们系三年级一位上海男生王锡忠就是被长矛刺中咽喉，最早死亡的，应该说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将长矛交到学生们手里的。王是“新人大”的，“新人大”在全北京的大街贴满他的遗像，称他为烈士，还把他的父母从上海接来，发了二年的抚恤金。1986年我到上海采访，很想能见到王锡忠的父母，了解他们的生活情景，但因在北京没有来得及查访线索，这个意愿只能埋在心里。我想如果是我的母亲，是等不到别人来采访的，她接受着那样的抚恤金，当场就会疯掉的。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对人类生命和财产最残酷、最无理的剥夺，也是对人类应具有的感情最无耻、最下作的蹂躏和践踏，只要你保存人类应有的一份优雅，保存着一点点人类之爱，你就会存在对“文革”的反叛心理。“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是欧洲诗人的诗句，而中

国，“文革”之后甚至迎来了一个诗歌的时代。涌到天安门广场的人们，无论你是文艺家，还是普通人，都在唱在跳，在诗如泉涌。1977年，我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大型文艺片《春天》的编剧，要求我要用诗歌把文艺复苏的每一个激情的场面描绘出来，串联起来。二十多年之后，我曾写下的激情迸发的诗句忘得一句都想不起来，反而“文革”如同埋在心中一座最为疯狂的奥斯维辛，让我不时去反思，它——也是我一生从事新闻事业的思想资本。

□ 选自高瑜《我的六四》

~~~~~

# 【痛定思痛】

没有人权的主权非常残忍

• 景凯旋 •

下面我要讲讲我的一些读后感，以反驳一些网友对人权与主权的错误观点。我要说：没有人权的主权非常残忍！如果是这样的主权，我绝不会捍卫！

一九八六年，文革结束十周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名作《动物农庄》。读罢之后，最初产生的强烈冲动就是：将这篇小说译介给国内读者，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个反思历史的参照物。两年后这篇小说终于得以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结果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本出版于半个世纪前，译成中文不过六万余字的小书在国外早已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先后被译成三十九种文字，至一九七二年仅英语本销量就已达一千一百万册。

而在一个最应受到理解的国度，它却遭到未曾预料的冷落。惊异之余颇有点说不出的无聊。当时的情形是，西方的各种思潮，尤其是个人意识的解放正风靡大学校园，学者们也正热衷于对东方文明的文化批判，沉浸在把社会又一次划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中。对当时大多数人而言，小说揭示的主旨显然是过于明晓而浅显，因而也就不值得一谈了。书籍的确有它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篇政治寓言小说，以隐喻的形式写革命的发生以及革命的被背叛，自然还有革命的残酷。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意，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统治者需要迫使猪与人结成同盟，建立起独裁专制；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明眼的读者自可看出，此书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

对于书中所揭示的革命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以及操纵语言歪曲真理的现象，人们尽可持不同看法。事实上，此书自经出版，对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顿过，社会主义国家自不待言，西方国家的知识界也是众说纷纭，右派认为它是抨击苏联社会主义，左派认为它也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使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描写了无数次杀戮，这些杀戮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不可理喻。在一九五四年英文版的前言中，伍德豪斯在谈到这些杀戮时用了这样一个评语——“毫无目的的残酷”。

这使我想到已经过去的文化大革命。

要说残酷，自然非文革莫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文革的残酷程度即使称不上空前，

也排得上前茅。通过一九八零年特别法庭的审讯，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种种阴谋，他们利用权力残酷迫害他人的罪行早已昭然于天下。迄今出版的大量文章和书籍证明，在对这伙人的揭露方面，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不遗余力的。

今天，人们公认的看法是，林彪、四人帮所作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有缘由的，即为了搞乱国家，以便乱中夺权。因而对他们来说，文革中发生的一切“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们需要这样，他们不这样倒是不可理解的。但问题恰恰在于，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切归罪于这伙野心家的政治阴谋，甚或仅仅归之于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就很难理解文革中出现的普遍的疯狂和荒诞，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将依然会停留在简单的水平上。

有朋友曾说，文革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说这话时是指在若干年后，对文革学的研究将养活许多吃学术饭的教授、副教授们。此言也许不妄，然而我总觉得有点轻松和可怖。

对于那些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这不只是一段记在纸上的冷冰冰的历史。显而易见，文革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道德人心各方面对我们民族性的暴露和检验是彻底的。说到底，文革是一场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历史运动，二十多年前的人们投身其中的狂热并不亚于今天年轻的追星族和摇滚歌迷，而且他们还被时代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肆意发泄的权利。从大量揭露的材料看，除了林彪、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件，许多针对普通人的骇人听闻的迫害都具有底层的自发性（尤其在文革前期），或毛泽东曾经所称的“痞子”性。这就不仅是少数几个坏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问题了。

这里，我想举两个事例。

据一些出版物披露，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红卫兵在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北京大兴县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打杀，从一个大队发展到四十八个大队，在三天时间里，共有三百二十五名“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被杀害，年龄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出生才三十八天，其中被满门杀绝的二十二户。

另一个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湖南道县曾发生由社队干部组织的滥杀无辜现象，共有四千一百九十三人被用枪杀刀砍、沉塘活埋、投洞绳勒等手段杀害，其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绝大多数，年龄最大者七十八岁，最小者仅十岁，此外还有三百二十六人被迫自杀。

此刻，在引用这些近乎枯燥的数字时，我感到生命有如蒿草的脆弱和轻贱，我很难从数字中想象他们在临死时的恐怖神情，他们最后一刻的活生生的感觉。这两件事例之所以特别令人惊心，是因其中所表现的残忍显得是那样没有道理，那样如同一场杀人游戏。

从受害者一方看，他们有别于被迫害致死的“走资派”或武斗中死亡的两派群众，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就被打翻在地，成为社会的最底层，大多数人此后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一直安分守己，规矩度日。作为一个个体，他们并不对政权构成任何威胁，甚至也无能力得罪任何人，这一点当时的人其实都很清楚（真正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倒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这一点后来的人也总算清楚了）。但即使如此，社会仍是容不得他们，文革中这些既无反抗能力更无反抗意志的人还是被剥夺了生存权，连初生婴儿都不能幸免，成了那个时代的祭品。

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尚不知凡几，迄今披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让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为了巩固专政，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与政权的巩固已没多大关系的人也是毫无必要的，然而事实还是发生了。从迫害者一方看（也包括那些参与杀戮的普通群众，如此规模的杀戮当然不会

仅仅是几个“坏头头”所为，由于法不治众，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无法追究，他们中大多数人今天应该还好好活着），无论是一些基层掌权者，还是普通的群众，参与这种杀人游戏并不能使他们自己获得名利，光耀门庭，时至今日仍很难令人明白，对于这些基层群众，如此的残酷究竟有何意义？能达到什么目的？是出于愚昧？恐惧？抑或是出于随大流？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他们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可能产生的一时的快感外，他们从中什么也得不到。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说明目的的虚妄。中国历史上缘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多矣，但像这种借“阶级斗争”的名义，大规模有组织地针对底层民众而又毫无目的的残酷，却无疑是文革的一大特色。

文革期间有一条著名的语录，“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论的话语方式，曾鼓舞了千百万人投身运动，在斗争中冲冲杀杀。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的，甚至于连恨都谈不上，有时仅仅是由于残酷能给人带来快感和自我的确立，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唯其如此，这种残酷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

记得有一年冬天，在我儿时生活的山区小城，唯一的中学校里早已没有了往日朗朗读书声，人去楼空，几个留在学校的十四五岁少年无事可做，突发奇念，想知道核桃树（当地盛产的一种树）叶的味道，按今天的说法，即想找点乐子，他们把关在“牛棚”里的几个老教师叫出来，让他们爬在地上，口含树叶，然后问他们苦不苦，回答自然是一迭连声的不苦。也许是觉得无聊，学生们又让老师叫自己“爷爷”，仍然是木然地叫，狂然地笑。对这些老师来说，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或许要比在大庭广众面前坐喷气式，阴阳头，戴高帽，衔稻草好受一些，但他们内心的灾难却是一样的。有时候，在轻佻的折磨中有着比严肃的迫害更为恐怖的东西。

岁月漫漫，记忆历久弥新。因为在这些学生中，就有我一个。尽管我当时尚小，只是在旁观，可那种情景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今天听起来这就像卡夫卡的故事，无论迫害者还是受害者，大家都明白他们（自己）是无罪的，但双方却配合默契，因为没有目的，所以整个过程带上了几分戏谑，就像大兴、道县事件中那些参与者一样，是不会太认真地打人的。随著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唯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或许也算一种“文革情结”吧。

今天，视文革为一处矿藏，几辈子也挖掘不完的人，大概为数仍是很多的吧。惜乎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有些话至今尚不能说，而能说的往往又是将昔日的凶残化为一笑，诸如书店里、小摊上那些记述文革的奇闻逸事。这种情形随著时间的推移已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的集体下意识遗忘，有意无意的掩饰，让人不免感到遭遇如此劫难的民族是否真的活该。

不错，以文学为例，揭露和控诉文革的小说、诗歌、电影、回忆文章、纪实作品等可谓卷帙浩瀚，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至少也说明了人们在不断思考，但伤痕文学基本上是站在绝对的善恶分明的立场上，将一切罪恶全部归之于林彪、四人帮，控诉其别有目的的残酷。尤其读叙述老干部遭受迫害的文章或作品（这类文章和书籍是目前最多的也是最易出版的），悲悯之余，我常常在想，如果不是那么多掌权者同老百姓一样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引起举国上下一致反对，有谁知道文革还会被定性为一场浩劫，而不是完全必要的某次运动的“扩大化”呢？还有谁会注意到大兴县、道县那些冤死泉下，连名字都不会留给后人的普通人呢？

反思文学似乎将人们导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由此产生的文化热至今不绝如缕，但将一切归之于民族的文化传统，诅咒黄河文明的延续，如八八年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系列节目所揭示的，则又使人有厚诬古人放言空谈之感，让古人为我们承担罪孽终究不够磊落。其实，即使封建的帝王也至少明白“家天下”的道理，不会毫无必要地把一个“莫非王土”的国家搞乱，以

迫害子民为治国伟绩。在这个意义上，文革与传统文化无关，甚至也与封建意识无关。今日之大言言谈文化优劣者，大抵皆类于这种凿空之论。

我觉得，在文化比较问题上，与其总是求异，不如求同，看看同一时期别的国家有无相同的情景。要比也不能与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比，道理很简单，试问有几个红卫兵读过四书五经？如果按照汤恩比的法，以文明作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来考察历史，那就应当看到，传统文化早在本世纪中叶就已产生了一个相当深刻的“断裂”，汇入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在被罗素所称的这另一个文化圈里，尽管语言和习俗不同，但在历史命运、社会心理、政治意识等方面，却大抵是相似的。就我们国家如何才能更顺利地步入现代化而言，对这一世界文化的长处和弊端进行研究，似乎要比研究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切题。

在我读过的书中，有两本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本是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一本是俄罗斯作家索尼尼辛的《癌征病房》。两书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革命是否一定会变质？历史运动与残酷是否必然一致？这种残酷对人类到底有何意义？

昆德拉的小说处理的就是一个关于残酷的主题：一个曾遭受过政治迫害的男人误把毒药给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当他得知后，他并无任何良心上的不安，而是一走了之。书中的情形，如受父母牵连的孩子被剥夺入学权利，街道退休老人组织干涉他人的私生活，看病要托关系走后门，以及人们说话的用语、口气，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在思考这桩行为时，拿自己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谋杀十分轻松，“没有任何动机，从中什么也得不到”。这句自白与书中那些孩子把猫的舌头割掉，用钉子钉进眼窝的细节，正是小说的点睛之笔：他们不由自主地采用了生活中所熟悉且畅通无阻的行为方式。

索尼尼辛的小说叙述的则是另一个残酷的事故，主人公为治疗癌征从流放地来到一个城市医院，他被捕完全是由于莫须有的原因，“有点象儿戏”，但却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书中有一个细节，主人公出院后去了动物园，看到猕猴笼内空空如也，说明牌上写道：“由于某游客毫无意义的残忍行为，致使住在此处的一只猕猴双目失明。那个狠心的人竟将烟末子撒入猕猴的眼睛。”主人公为此悲愤莫名。小说结尾，主人公躺在列车的行李架上，脚尖悬在过道上空，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他的内心独白——“平白无故”。

两部小说都以相似的细节，揭示了历史暴虐的毫无必要和人性邪恶的不可理喻。如果说这也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那么，文革与此是相似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之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

认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因果律和效用论之上的常识。有了这常识，动机才能成为犯罪学的基础。如果一旦世上都是毫无动机的谋杀，把我们的思维与现实联系起来的因果律就会失效，任何健全的司法制度都将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犯罪心理学的绝佳题目。

事实上，人类在残忍这点上并不比动物更进步，人与人之间许多仇恨和残忍都是无缘无故的，在许多方面往往超越了因果律的范畴。正如昆德拉在同样一本书中借主人公的话所说，“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别人死。”“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从远处进行暗杀，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他的话或许过于阴暗，好在法律是论迹不论心的，至少由于害怕惩罚，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必非做不可，那种毫无目的的暴行才不会轻易付诸实现。只有在受到保护和鼓励的前提下，人性的邪恶才曾被释放出来，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

在我们曾经有过的政治文化中，无疑有着某种释放残酷的机制。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文

革为这种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北京大兴县惨案的同一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指出：“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推论起来，这里的“吸血虫”和“人民的仇敌”是指那些早已驯服、毫无权利的最底层人，而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想要斗倒的各级“走资派”。时至今日，人们仍能从这中间嗅到血腥的气味。

当最高统治层发出号令，任何无缘无故的仇恨和渲泄便都被赋予了阶级斗争的充足理由和不受惩罚的法律保证，大兴、道县那些无辜者既然可以毫无目的地出于对领袖的爱被公开杀戮，那些少不更事的孩子对自己老师的施虐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戏谑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政治行为的一种模仿罢了。

回首三十年前事，亦如风雨亦如烟。徘徊于荒草萋萋的往事之中，我感到一种无处凭吊的悲哀。三十年前发生的一切依旧像淤泥堵塞在胸口，使我难以呼吸。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也许这就是《动物农庄》中的动物们最后萦绕在心头的无声的询问。

为什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